



岭南文化·河源风物志

核心提示

同治版的河源县志,专用了一节《民风》来详述当时河源的民俗民风,将河源人崇文重教、吃苦耐劳等优点先说了,也不讳言提到一些人笃信鬼神、负气轻生、喜欢歃血结盟等缺点,里面提到了“赌博之习,从前盛行,近岁禁严,此风渐绝。然其欲为之心,或未尽消也。再三申敬,杜其根株,当久而自化。”

1936年,有司痛陈河源县赌风之盛、赌博之害:“为害甚烈,废事失业,劳神伤财,而窃盗欺诈之事,往往因此而生,不特妨碍治安,抑亦大伤风化,虽三令五申,迭示禁止,但一般赌徒视功令如儿戏,又故态复萌,此种行为,何啻促人服毒,殊属痛恨。”

赌博之危害人所共知,或害己身,或破其家,故各姓家训族规中,常有禁戒赌博一条,若有犯之,轻则责罚,重则赶出祠堂。各时期官方也曾明令禁止,晚清、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河源、龙川各县曾多次下令严禁,突查赌场,销毁赌具。

倘有赌博 重责不宥

——晚清民国时期河源官方与宗族联手治赌往事

清末河源各界力撑粤省禁赌

清末以来,一直有“赌风之盛,以广东为最”的说法,有司明令禁止,但彼时社会动荡,无法从源头杜绝,“粤东赌博与中国鸦片同一毒病,非有峻法,循习弗除”“粤东赌害火热水深,比年以来,全省绅商士民奔走呼号。”(沈云龙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》第50辑)禁赌已成社会共识。因为赌博,丢了官职和声誉的也不鲜见于报端。1907年,龙川县令何得因纵容烟赌,上了《振华五日大事记》的《本省大事》栏目。“赌博为害国害,龙川业已筹抵赌餉,自应认真禁止,何以吏役棍徒复敢肆行开赌?”对龙川此事,“仰广东按察司会同布政司即飭惠州府确切查明禀复,如果实有其事,即责成该县严行究禁。”

自晚清咸丰十年(1860年)起,广东对赌博行为和赌博营业场所抽收税捐,是为赌餉。交了赌税,赌风更炽,当时《申报》如此描述广东赌风:“今自城郭、市镇以至荒村僻壤,无不有赌具,赌不择地,神祠、社庙皆赌场也;赌不择人,兄弟、亲戚皆赌友也;赌不择物,凡可以较胜负者,皆赌具也。由小以至大,由富以至贫,由晨以至夕,无老无幼,无贵无贱,无男无女,无智无愚,大都以赌为生,以赌为乐。”

宣统二年(1910年)10月14日,广东咨议局成立后,就一直致力推行全面禁赌,但为了能顺利实现,提出了“筹抵赌餉”,以盐饷抵赌餉,艰难推行之际,得到了广东各地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,河源、龙川等县亦在其列。

次年(1911年)10月的广东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上,咨议局呈请两广总督袁树勋即日请旨宣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期限,袁再三敷衍拖延,咨议局表示再不迅速奏请,将全体辞职。袁树勋被迫上奏,清廷颁旨要求“察核具奏”,于是禁赌之议,即行铺开。

此次会议期间,11月9日提出的“严禁安梁公司铺票议草”,采用记名投票表决,赞成禁赌书“可”字者,仅有丘逢甲、陈炯明等20人,反对禁赌书“否”字者,有刘冕卿、苏秉枢等35人。议员陈炯明叹道:“禁赌而庇护之,如此议员,乌得不为广东哭也。”咨议局相关成员接连递交辞呈,继而丘逢甲率所有20人“可”决议案辞职。这20名议员中,有惠州府议员5人,为陈炯明、李滋湘、邓承善、彭宝森及黄云章。

消息传出,舆论哗然。省内各团体纷纷致电两广总督施加压力,同时致电咨议局支持禁赌,抨击庇护议员。惠州商会“决不承认区赞森(‘否’决议案)为商业研究总公所议长”,粤孔会致报界公函称“粤孔会会员区赞森庇护赌害群,特集众公议,除去会员名籍,不认为会员”。

与会的惠州府议员有5人,为陈炯明、李滋湘、邓承善、彭宝森及黄云章,前4人均赞成禁赌,唯黄云章独书“否”字,“其果为赌

商之运动?抑为无意识之附和?虽不可臆度,而语意谬妄,殊失代表之资格,深负选举之希望,不能除害,反以纵害,玷吾惠之名誉犹小,害全粤之人民实大。”河源县绅学商界代表黄兆蓉、邱象尧、潘维贞、邱荣勋、潘维衡、邱其光、李近光、黎若珉、萧治刚、马兆麟等50人联名致函咨议局,痛批黄云章,表示河源绅、学、商各界决议,不认黄云章为惠州人,同时也不认提出“否”的35人为咨议局议员。(1910年12月4日《申报》)

省内各地各界也纷纷致电两广总督、自治研究社、报界公会等,要求严惩庇护议员;各界人士齐集明伦堂,举行禁赌大会。迫于舆论压力,35名“否”决议案宣布集体辞职。此事的结局颇令人欣慰:1911年1月8日,署两广总督张鸣岐接到北京宪政编查馆来电,准庇护的“否”决议案刘冕卿等35人辞职。3月30日,下令广东全省禁赌,所有番摊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一律查禁。“鉴于赌博为害广东一百数十年,非一纸禁令所能必止,必须制定专条严厉惩治才可收效,广东咨议局会同张鸣岐议定《广东禁赌条例》,改以盐斤加价和烟酒增税的办法来弥补短少的收入。7月,清政府颁行《广东禁赌条例》。这是可决议案获得舆论的支持,争取到清廷下诏禁赌的最后胜利。在张鸣岐宣布禁赌期间,广东公开的赌博停止,禁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”(冀满红、刘文军《清末广东咨议局与禁赌》)

1911年11月9日,辛亥革命爆发后次日,广东宣布独立,成立军政府,推行新政,禁赌仍是雷厉风行推行的其中一项。1912年夏,针对广东和平县对赌犯黄湘洲只是处以罚款“敷衍了事”等情况,广东总巡靖州经略陈炯明会及会办龙济光通谕各县:“要知道赌博最为民害,现归本处督办属于军事范围,自属应予惩办杀一儆百”“嗣后拿获赌匪,务应按法严办,不准罚钱了事”。他以霹雳手段军法治赌。为使禁赌有效地施行,陈炯明还制定了《广东赌博治罪暂行章程》9条及《施行细则》3条、《县知事实施禁赌办法》7条。陈炯明治粤的上世纪20年代初,广东赌风为之一涤。

然而民国初年政坛动荡,政令难以持续,广东赌风时而被煞住,时而为筹饷计又被鼓振。1925年10月,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取得东征胜利,随军东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,主持东江的惠州、潮州、梅州地区所属25县行政工作,提出了几项施政纲要,其中便有“禁绝烟毒”这条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12月《广东全省风俗调查》中关于河源县有无赌博及吸、种鸦片情况,有关人员填报为“有少数赌博吸食鸦片,仅年老者有为之。亦少种鸦片,前有今无。”这实际上算是一种瞒报,赌博之徒亦多有中青年。

陈炯明大规模禁赌后,到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左右,有司又开始征收烟赌税费。蓝口、黄村一带的第九区自治筹备处主任张青史,因感于该区民众备受烟赌之祸,欲于其本区范围内,提倡禁赌。为此,张青史在黄村贴上布告,于当年农历三月初一起,禁绝黄村烟赌,如有人敢赴赌及吸烟者,即予追究。

张青史这项措施,使有司收不到赌餉。承办蓝口大江一带防务经费商人李业、河源全属防务经费源公司商人缪成向时任河源县长张尔超呈文“举报”,先以民国广东财政厅章程来说事:“查前奉财政厅颁发章程,如该处地方欲禁绝烟赌,须垫偿该处之额餉。”责难“该区主任擅行禁绝,餉源损失,当负其责”并“恳请转呈县长,迅令该主任即予以取消禁绝烟赌,以维餉源”。

张尔超是民国时期河源官声甚好的一位官员,他接报后,亦须将此事呈报当时的省府,他首先表明对鸦片与赌博的深恶痛绝态度:“查烟赌之害,甚于洪水猛兽,吾粤盗风之盛,推厥缘由,多由于人民嗜赌吸烟,倾家荡产,以致流而为盗匪。烟赌伤风败俗,废事失业,弱种误国,种种弊害,不一而足。简括言之,烟赌为社会万恶之源。”他也从全省当时政策出发:“现值训政时期,厉行地方自治,烟赌一日不禁止,即地方自治之可期”并为张青史说好话:“第九区自治筹备处主任张青史,向日办事,尚属认真,目下因感于该区民众,备受烟赌之祸,欲于其本区范围内,提倡禁赌,实属美举。”他不希望这样的好官受到责罚:“以该区自治主任,对于本区施禁,亦犹一乡一族,以及一家之长,对于其本乡或家族子弟,严禁禁赌吸烟,理由至为正大,似未便干涉其禁而反令废弛,致失政体。”(1930年4月25

官方不停地忙于禁赌,城乡各姓家族也将禁赌列入族规家训,劝诫族中子弟远离破家害身的赌博活动。

在原河源县,比较有名的一个赌徒回头的故事,发生在今天的河源县南园古村。古村老衙门主人潘世拔年少时个性自由,嗜赌成癖,其父潘绍信恨其不争气,且屡教不改,有违于潘氏祖祠家规,一气之下,要处死这个“烂赌鬼”。潘世拔母亲黄氏如何肯让儿子丢命,她教尚不知灾祸将临的潘世拔逃回家门,临行当晚,黄氏在村中的六曲桥与他道明真相并行劝诫,泪洒而别。若干年后,潘世拔在浙江当了官,衣锦还乡时,经过六曲桥,想起当年仓皇逃离的心境,与现下风光相比,恍如隔世。他在六曲桥上感慨万千,对随从和族人说:“六曲”之“曲”字,意即人生多坎坷,须经诸多曲折,才能踏上坦途。由此,村人走过

民国河源严厉禁赌 有基层公务人员殉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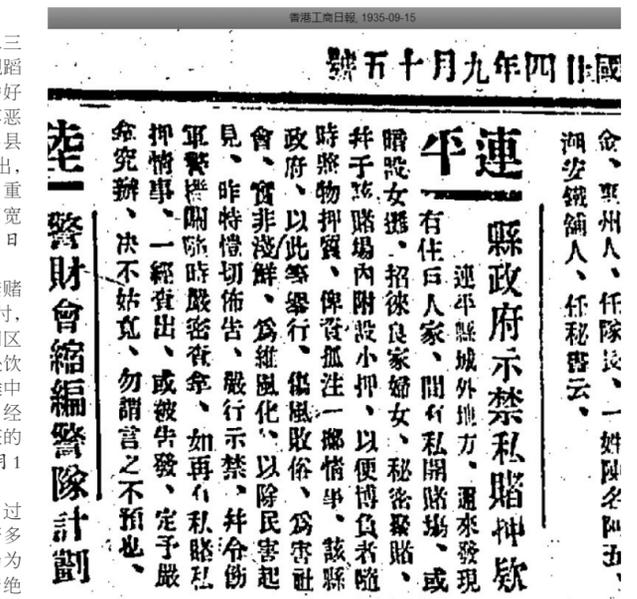
日《香港华字日报》) 彼时新式学校推行已有二三十年,学生年龄跨度较大,循规蹈矩者固不乏其人,而有不良嗜好者亦复不少,一些学生有赌博恶习。1934年2月,时任河源县县长钟耀焜特重申禁令,一经查出,定以严拿,轻则记过以示薄惩,重则开除学籍,依法究办,决不宽待,以端学风。(1934年2月22日《香港工商日报》)

当时有基层公务人员因禁赌被害。1934年2月22日下午4时,办理乡事颇有声誉的河源县四区黄塘乡乡长甘卓立,在往邻乡友处饮新年酒的路上,被预先埋伏在途中大塘山凹口的歹徒放枪打死。经查,这些歹徒是此前甘卓立查获的黄塘乡赌窟之赌徒。(1934年3月1日《香港工商日报》)

至1936年,自农历新年过后,河源县各地乡村赌档逐渐多了起来,且种类繁多。县当局为杜绝根源起见,特拟定严厉禁绝杂赌相关条款,于2月23日颁行,如有赌博者,初次惩罚释放,倘又再犯,充苦工二年。(1936年2月26日《香港工商日报》)

因赌博斗殴乃至丧命的惨事屡有发生。1935年2月,河源东廓乡40岁的马某,趁着农历新年,在乡中谭公爷庙开赌博档,当地无知乡民前去玩耍的不少。有该乡农民阮阿桂,趁着农事之暇,不时去赌,接连败北,积欠赌款廿余元,由马某代付,约定5日内归还。期届不能偿还,阮藏身于附近莫阿家,为马债悉,于是招集数人揣刀追债,发生争执,马持刀刺阮,阮当即倒在血泊之中,似有性命之虞。畏罪潜逃的马某被警察追缉。

1936年2月,柳城圩请了戏班演戏,有人趁热闹聚众赌博,对岸南坝村民罗春过江前来赴赌,与一陈姓赌徒因数目争执打



1936年9月15日《香港工商时报》报道连平县禁私赌押款。

架,罗春不能敌,负气而退,是夜归家,复持短枪前往该处,将其一人枪杀后逃去。有些地方女性也参与赌博。1936年9月,连平县城外有住户人家,私开赌场,暗设女摊,招来妇女秘密聚赌。有的地方还设小押,以便赌输者将物品抵押还钱。连平县特地发出布告,严禁私赌私押。

当时河源县查赌禁赌决心很大。次年2月,有司闻知河源县城有不法之徒暗中招人开赌聚吸(鸦片),以资营利,派县警侦查,于当7日夜,探悉新城西门街住户,有歹徒潜匿,聚赌吸烟,当场捕获烟徒李耀等13名,检获烟膏、烟具及煮烟物件多种,麻雀牌、天九牌各1

副,遂将各犯带案讯办,及将开赌屋宇查封。同时又在附城双下乡捕获烟赌窟2所,拿获烟赌牌12名,烟膏烟具多种,麻雀牌1副,纸牌7副,一并押解县办。(《香港工商日报》1937年2月15日)

为彻底禁绝赌博,1937年4月,河源县政府飭附城分局派出警员,分赴各商店住户,搜获不少各种赌具。19日,将山一般的各种赌具堆在中山公园纵火焚毁,以警惕市民。(《香港工商日报》1937年4月22日)

民国廿七年(1938年)4月,时任和平县县长李则谋通飭各乡镇保甲长,要求切实查禁赌博,如有奉行不力,致赌风复炽,则究不贷。

城乡各姓族规家训明令禁赌

六曲桥时,常会记起六曲桥与潘世拔的这段渊源。

紫金郑氏家训明令“禁赌博”,“族内倘有犯此,重责不宥”。龙川义都梁氏由河源蓝口迁入,其“族章十戒”中第七条即为“切戒酗酒博博”。毛氏家训有“家戒六条”:一戒游荡,二戒赌博,三戒争论,四戒横霸,五戒博法,六戒酗酒。这些禁戒,都是祖辈生活中得来的经验教训。龙川崔氏族规中阐释“无作非为”一条中说道:“人无论智愚,家无论贫富,若然酗酒博博,好勇斗狠,嫖娼奸淫,无赖恣意妄行,皆谓之为非的人。族内若然有此辈,力加劝教,免至貽累族姓,上辱祖宗,下玷家声。屡教不改,情节严重,族内所当屏逐其自新。”逐出家族后,名字也会从家谱中划掉,并剥夺姓氏,死后无法进入本族族谱中,也不能葬在家族的墓园中,从此“无根无源”。

上世纪20年代初,陈炯明在广东军法禁赌时,曾颁布过《县知事实施禁赌办法》,明确了各姓族长亦有劝导禁赌之责:“各县团董绅士、族长、街甲、地保均有劝导禁赌之责,于县属各圩宣讲之。圩场由街甲完全负责,村落有地保者,地保与族长共同负责;无地保者,族长完全负责;无族长者,指定该姓绅士代行族长职务。宣讲内容由县知事以国语编刊分发。”“各县团董绅士、族长、街甲、地保均有首告犯赌之责;各区团董绅士另负有拿解赌犯之责。各地方遇有赌博发生,即由该管之族长或街甲地保,飞报该管团董绅士,督团拿解县公署究办。该管团董绅士如认为恐有抗拒之虞时,应立即报告县公署警队拿捕之。”“地方遇有赌博发生该管之族长或街甲、地保匿不首告该团董绅士,或该管团董绅士不予拿解转报者,由具体案情节

轻重,随案呈请省长总司令,予以相当之惩戒……”在这些严厉的条款督促下,各姓族长对族人于禁赌上的宣讲与管理甚到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于禁赌上力度愈加空前,社会上大规模赌风渐息。1949年秋冬,龙川县第三区人民政府(辖铁场、谷前、石坑、田心、龙母镇,驻铁场圩)执行上级有关禁烟(鸦片)、赌、娼的通令,开展禁烟、禁赌、禁娼运动,彻底收缴了一大批烟具、赌具,烟、赌、娼基本禁绝。



本报记者 凌丽